

全面系统评述阿英著作
国内第一本阿英的传论

· 修订版 ·

AYING ZHUANLUN

阿英传论

吴家荣 ◆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全面系统评述阿英著作
国内第一本阿英的传论

·修订版·

AYING ZHUANLUN

阿英传论

吴家荣·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英传论/吴家荣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5

ISBN 978 - 7 - 5336 - 2965 - 6

I . 阿... II . 吴... III. ①阿英(1900~1977)—
生平事迹②阿英(1900~1977)—文学研究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9727 号

出版人:朱智润

责任编辑:万直纯 丁蔚

装帧设计:吴亢宗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 编:230601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50 mm×960 mm 1/16

印 张:18

字 数:260 000

版 次:2009 年 12 月第 2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0551)3683078

序 | 钱 瑶 钱厚祥

近几年来,我们陆续读了吴家荣先生对阿英著作所写的评论文章,现在,吴先生的《阿英传论》又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我们由衷地感到欣喜。因为这本专著是国内第一本撰写阿英的传记,是全面系统地评述阿英著作的研究成果。它对研究阿英的专家、学者们,将是极好的借鉴;对后人认识和研究我国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革命文艺运动及左翼作家,也会得到有益的启示。

今年是阿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阿英全集》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阿英传论》也即将出版,相信这本专著对读者了解和理解阿英作品的内涵,会起到深一层的认识作用。

阿英的著作涉及范围很广,有小说、散文、诗歌、俗文学,还有近代及晚清文学史等,这些作品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写,也有些作品,则是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在特殊的环境中,作为与敌人进行无声战斗的锐利武器。吴先生在研究这些作品时,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不远离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不浮躁、不片面地分析研究,进行评述,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也正如作者所述:“……他创作中的成就与不足,只能放在他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去考察,只能联系阿英的革命经历及战士的品性去分析。”是的,只有以这样的观点、方法进行研究,才能“显示了无产阶级文艺虽不免幼稚却辉煌的昨天。他的作品对于唤起人民的反抗精神,鼓舞人

民斗争的热情，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严谨的研究学风，还表现在他对阿英著作研究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和有关著作，经过深思熟虑后而进行评述的。如当他写《论阿英的红楼梦研究》一文时，就阅读了胡适、俞平伯、李希凡等人的有关红学专著，查阅了历年来对红学研究的史料。这篇专论发表于1994年的《红楼梦学刊》，并获得安徽省第三届社科优秀成果奖。又如，他在撰写《阿英与晚清小说研究》一文时，则认真阅读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及《中国文学史》等著作。可以说，吴先生的每一篇阿英研究文章都写得十分辛苦，写得很有分量。

吴家荣先生是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20世纪90年代初，他参观了芜湖市镜湖畔的《阿英藏书陈列室》，为阿英一生孜孜不倦地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做出的卓越贡献所感染，因而萌发了研究阿英的决心。当他写的第一篇论文《阿英历史剧对现代历史剧的贡献》于1991年在国家重点级刊物上发表后，两家刊物先后转载，增强了他对阿英著作研究的信心。他认为阿英“追求真理、无私奉献、勇于开拓、不断进取”的精神，在当今商品经济社会中，更显得可贵，更值得倡导。因此，他花费了近十年的时光，排除各种干扰，发扬锲而不舍、专心致志的精神，终于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我们与吴先生相见，是在今年2月，芜湖市文化局、文联举行的“纪念阿英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时，此前，由于吴先生缺少阿英的著作及有关资料，于1997年辗转写信给我们，商借图书和资料，我们当即将他所需的图书资料邮寄于他，至今也有三年多时间了。通过书信往来，我们相互有所了解，并建立了友谊。现在，他要出版《阿英传论》专著，要我们为这本书写序言，我们深感难以胜任，仅作此短文，以表我们对本专著出版的祝贺和对吴先生的感谢之情。

2000年10月30日

 目录

序(钱缨 钱厚祥) / 1

第一章 导论:论阿英现象 / 1

第二章 阿英传 / 13

第一节 家庭与时代 / 13

第二节 早期的芜湖活动 / 17

第三节 从武汉到上海 / 20

第四节 “太阳社”的中坚 / 23

第五节 “左联”期间 / 28

第六节 孤岛斗争 / 36

第七节 新四军中 / 42

第八节 在大连、天津的日子 / 47

第九节 北京任职 / 53

第十节 最后的岁月 / 60

第三章 作家论 / 65

第一节 阿英早期文艺思想 / 67



第二节 阿英的历史剧	/ 82
第三节 阿英的散文	/ 91
第四节 阿英的诗歌	/ 103
第五节 阿英的革命小说	/ 116
第六节 阿英的人生小说	/ 126
第七节 阿英的电影创作与评论	/ 133

第四章 学者论 / 145

第一节 阿英的晚清小说研究	/ 146
第二节 阿英的《红楼梦》研究	/ 159
第三节 阿英的弹词研究	/ 172
第四节 阿英的民间艺术研究	/ 182
第五节 阿英的晚清文学史料研究	/ 195
第六节 阿英的辛亥革命文学研究	/ 206
第七节 藏书家阿英	/ 214

附录一 阿英的原名、笔名 / 221

附录二 阿英子女笔谈阿英 / 224

附录三 阿英著作一览表 / 232

附录四 阿英年谱(钱厚祥整理) / 243

后记 / 281

再版后记 / 283

第一章 导论：论阿英现象

—

阿英，曾经辉煌过。

阿英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个文学社团——“太阳社”的中坚与战将。一篇《死去了的阿Q时代》，虽有着激进中的幼稚，却以惊世骇俗的否决精神，激起了文坛的震荡；左联成立，他任左联党团书记、执委会常委；中国文化总同盟诞生，他又是文总的常委兼宣传部长。他一生著述百余种，数千万言，涉猎戏剧、散文、小说、诗歌、文艺评论、小说史、民间艺术研究、文学史料研究等众多领域。而且在不少领域，他都留有不容忽视的成就和开拓性的创举。

二三十年代，阿英高倡“力的文艺”，为新生、稚嫩的无产阶级文学呐喊助威。他较早地运用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从革命功利主义的立场上阐释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目的、纲领、任务，并对大量作家、作品进行了立足于现实意义的评论，促成了普罗文学的高涨。他在当时评论作家之多、影响之大，堪与茅盾比肩。抗战时期及稍后，阿英以惊人的精力创作了十一部话剧。夏衍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剧本写得最多的一是郭沫若，二是钱杏邨。”^①特别是阿英创作的五部历史剧，鲜明的爱国主题、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荡气回肠的革命豪情，以及娴熟的艺术技巧，不仅极大地鼓舞了时人的抗日斗志，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而且较成功地处理了史与剧、古与今的关系，走出了一条历史剧创作在忠于史的前提下服务于现实斗争的新路子。

^① 夏衍：《忆阿英同志》，《阿英剧作选》，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

阿英近百万字的散文，充满生命活力，富含人生哲理，流畅素朴、隽永耐读，从而给百花争艳的散文园地奉献出一朵别有韵致的奇葩。阿英还是“中国共产党人中第一个搞电影的同志”^①。他为用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占领电影阵地作出了毋庸置疑的贡献。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则是中国断代小说史的第一部；他的《弹词小说评考》也是中国三百多年来最早研究弹词小说的一部专著。此外，阿英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国年画发展史略》、《中国连环图画史话》等著作，虽有粗疏之嫌，也都以其开拓性的研究成果誉满海内外。

阿英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多方面建树的作家、学者。然而，解放后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以及各类学术著作中，仅在论述抗战时期的戏剧时，谈到阿英的历史剧，鲜有人对他多方面的成就作全面的评价；几十卷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也不见《阿英研究专集》出版；除了阿英的子女在1999年出了一本《镜湖水》，回忆阿英的生平外，至今未出过一本类似《阿英评传》的著作。这是值得深思与费解的现象。阿英，确实是中国现代作家、学者中非常特殊的“这一个”。他看起来似乎与沈从文、钱钟书，或是茅盾相近，都走过了由作家而学者的人生之旅。然而，细加分析，却又迥然相异。茅盾在解放后，身居文化部长要职，繁忙的领导工作挤占了他体验生活、从事创作的时间；阿英则长期蛰伏于文联副秘书长闲职，加上他本人的淡泊功名而很少抛头露面，他是不乏时间去搞创作的。钱钟书则是有着学贯中西的深厚学养，研究学术本是他的专长所在；阿英却是从腹地小城中走出来的“土”作家，从未跨出国门深造，最高学历是中华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工程系肄业，几十年血雨风霜、跋涉呼号的革命实践，丰富了他的创作素材，磨炼了他战士的品格与心性，却难以给他厚实的学术素养。他也不同于沈从文，沈从文进入红色政权之前是个灰色的中间作家，解放后因对政治的心有余悸，而乐在故纸堆中寻求精神栖息的家园，并以此为他心中挚爱的祖国作一点贡献；阿英是1926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始终与革命共命运、同进退，他与共产党内的许多高层领导人有着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陈云同志、陈毅元帅曾是他

^① 于伶：《默对遗篇吊阿英》，《阿英剧作选》，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

的老领导；李克农上将是他的同乡同学，并由阿英介绍入党；黄克诚、张爱萍、叶飞、李一氓等都是他的故交好友。然而，解放后的阿英却自甘寂寞地选择了学术研究之路，乐此不疲地默默耕耘，虽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却缺少恰如其分地评价。

解读阿英，我们可以看到伟大的时代风云、曲折的革命历程如何造就了一个寻常人的非凡业绩；可以窥视阿英一类知识型人，心灵深处永远抹不去的文人情结；也可以使我们思索，怎样使共和国的天空多一点明媚的阳光，少一点晦暗的云彩。

二

环境塑造人。植根于阿英心灵深处的文人情结是环境的产物。阿英出生于手工业者家庭，5岁时，其父钱聚仁就将他带在身边，教他断文识字，7岁阿英入私塾，两年后，阿英又跟一个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的姜老夫子研习四书五经。由此，阿英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古文根基，也养成了他一生爱读书的习性。当时，政局动荡、晚清覆灭、科举废止、新学兴起。钱聚仁有点文化，思想也不保守，还与牧师有点交往。阿英10岁那年，钱聚仁顺应形势送他到徽州小学接受资产阶级的新学教育。以后又利用各种关系，先后送阿英到教会办的芜湖圣雅各中学、安徽省立第一商业中学以及耒复会办的萃文中学读书。在教会学校，阿英接触到西方的先进文化，并对一些欧美文学名著发生了强烈的兴趣。15岁时，阿英就在上海的《中外日报》等报刊上用“梅隐”笔名发表译作。他还在《南社》、《民权素》等报刊的影响下，如饥似渴地熟读了不少古代诗歌、散文以及《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阿英从此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那不是一个能让人安心读书、做学问的时代。很快，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波及到家乡芜湖，作为一名具有民族意识、民主思想的热血青年，阿英理所当然地投身于革命浪潮，走上了不断追求真理的艰难的革命之路。

几十年的革命经历、战士生涯，阿英心中的文人情结非但没有抹去，反



而愈加浓烈。这是因为阿英一生基本上是以文化战士的身份从事革命的宣传、文学活动。他是以笔作戈，唤起民众的觉醒，推动革命的发展。“五四”时期，当时还在中华专门工业学校读书的阿英，就参加了上海学生界联合会，编辑学生会的《日刊》。1920年，阿英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劳动界》杂志上发表一篇调查报告《南京胶皮车夫的状况》，沉痛地指出：胶皮车夫“每天就做那非人生活至‘力竭声嘶’，也不能供养一家；何况还有生病的时候呢？”他鼓动：“我们何不群起合作，推翻资本家，尊重‘劳工神圣’呢？”假期，阿英回到芜湖，继续写稿、办夜校，启迪民众起而奋斗。他在1920年10月8日芜湖的《皖江日报》副刊《皖江新潮》上发表了一篇言词激烈的批孔文章：《孔丘也配称至圣先师吗？》，激起轩然大波。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芜湖成立了全市统一的反帝机构：芜湖外交后援会。阿英任编辑组的负责人。1926年初阿英与编辑组同仁创办《苍茫》文艺性杂志。他在该刊发表了《到民间去》的一篇读书日记。号召知识青年向俄国青年学习，“把自己的生命为民众牺牲”。大革命期间，阿英在武汉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编辑科工作，主要任务仍然是编辑宣传品，鼓吹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与蒋光慈、孟超、杨邨人等成立了革命文学社团《太阳社》，建立发行机构春野书店，出版发行《太阳月刊》，以后又参加左联工作。开始了主要以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手段的另一面的战斗。这期间，他发表了不少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有力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抗日战争期间，他先是坚守孤岛，编辑大型刊物《文献》，建立风雨书屋，出版抗日文稿，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同时创作戏剧，鼓舞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孤岛沦陷后，他举家奔赴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在阜宁停翅港一带，协助陈毅军长建立文化村，组织湖海艺文社；帮助新四军军部和三师鲁迅艺术工作团、一师一旅服务团、新安旅行团、盐阜区各县文工团开展戏剧活动，并主编大型杂志《新知识》及盐阜报副刊《新地》，为开展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和统战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文艺工作者。解放战争期间，阿英任华中文协戏剧委员会副主任，编辑机关刊物《江淮文化》，不久，兼任华中建设大学文学院院长，以后又任华东局文委书记，还在大连市委宣传部文教委员会工作，经常深入工厂开展文娱活动。北平解放，他又到北平参加筹备

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会后调到天津任文化局长。1951年任华北文联主席。1954年华北行政区撤销，他改任全国文联副秘书长直到去世。

阿英的经历告诉我们：当阿英从事的革命工作与他热爱的文学活动相吻合的时候，阿英的才能往往发挥得最充分，他对革命的贡献也就最大。浓厚的文人情结、对革命的执著追求，是造成阿英集战士、作家、学者于一身的深厚原因。

三

阿英始终是一名党的文化战士，或者可以说，他是以文化人的身份从事党的文化、宣传工作的。因而，他的文人情结在革命实践中有增无减。这种文人情结突出表现在他对文化事业的特殊感情，对文化工作的强烈兴趣；表现在无论环境怎样险恶，他都不忘买书与写作，并多次对书籍、文稿的失散痛心疾首。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家乡从事革命活动的阿英逃离芜湖，辗转千里来到武汉。宁汉合流，他又逃出武汉返抵芜湖。在近半年的颠沛流离中，阿英坚持写日记，这就有了《流离》的问世。“孤岛”沦陷，阿英举家冲破敌人封锁，来到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自42年5月至47年6月，阿英“多年如一日，在简陋的农舍里，在暗淡的豆油灯下，坚持不懈地写日记”^①。这些日记，阿英以后结集为《敌后日记》出版。写日记，无疑是文人的特殊嗜好，然而在环境极其艰苦、生活漂泊不定的战争岁月，阿英竟能写出数百万言的日记，没有坚韧的毅力与强烈的兴趣，是难以坚持的。阿英执著的文人情结还表现在“他做梦也想看书。”^②阿英的子女在《镜湖水》一书中写道：“书是父亲一生重要的精神支柱，看书、买书、写书是他生活中时刻不可缺少的内容。”的确，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阿英只要身边有点钱，他最爱

① 钱缨、钱小惠：《镜湖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钱缨、钱小惠：《镜湖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去的地方就是书市。在 30 年代的上海，阿英常常一整天泡在书店里寻访旧书，有时满载而归，有时一无所获。他的散文《城隍庙的书市》、《西门买书记》、《海上买书记》、《苏常买书记》、《浙东访小说记》里就生动地记叙了他寻书、买书的酸甜苦辣。在苏中、苏北动荡的游击环境里，阿英每到一地，都尽心搜集各种报刊、书籍，一旦转移，他又不顾疲劳，细心地将书籍编号、装箱，交给老百姓代为保管，少数重要的书则带在身边。解放后，阿英办完了公务，总爱带着图书管理员去书店选购图书，他的小车几乎成了采购图书的专车。他常常在梦中为觅得好书、奇书而笑醒。他一生最伤心的事便是文稿、书籍的丢失。太平洋战争爆发，阿英临去苏北时，将珍藏的报纸和部分书留在原地。后被代管的克美医院的医生卖掉了。藏在另一处的手稿、书籍，也被蒋匪军煮饭烧毁。阿英每念及此都异常难过。“文革”中，阿英被挂牌批斗、受尽折磨，然而最使他痛心的是几十年购置的数以万册的图书字画被“四人帮”抢夺一空。1976 年落实政策，大部分书被归还。此时阿英的肺癌已到了晚期，长时间的化疗已使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可他每天躲在房间里，默默地整理书。累了，他靠在床头或坐在沙发上，深情地凝视着满屋的书，有时半夜里仍在翻看这些失而复得的书。这是阿英晚年精神最大的寄托、生活惟一的乐趣。

醇酒般浓烈的文人情结，对阿英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阿英虽然是 1926 年入党的老党员，但他一直没有进入党的较高的决策层。始终只是一名忠实执行党的意识形态政策的战士。解放后稍有一点极左的风浪，他连保护自己的力量都显得那么软弱。同时，他也不像那些戎马一生、粗通文墨的部队干部，阿英的心灵深处多少保留着一块属于他自己的精神园地。这使他有着一般文人的自尊和旷达；他对事业、对学术的追求远甚于对功名地位的看重。特别是随着他个人学养的日渐丰厚，这一特点显得尤为突出。阿英由上海到苏中根据地时，先抵一师一旅，当旅长叶飞希望阿英能在一旅工作一段时间时，阿英愉快地答应了。他随旅服务团一起行动，帮助他们开展文艺工作，亲自改编、排练话剧《小奸细》，并利用战斗间隙，给服务团同志讲中国戏剧运动史。阿英平易近人的作风博得了广大团员的爱戴。1947 年，阿英到了大连，组织上问他是在市内做文艺领导工作还是去工厂开展文

娱活动，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是想在这里摸索出一些开展工厂文娱活动的经验，将来好在全国推广。事业上如此，学术上也是这样。阿英一生乐于笔耕，却不太在意于别人对他的学术评价，更不会利用自己的资历、地位暗示别人为自己吹捧立传。他待人诚恳，为人谦和，性格内向，有着高度的文人气质与修养，具有博大的同情心。文联开会批判胡风时，胡风在会后想要回发言稿作些修改，宗璞请示阿英，阿英宽厚地答应了，没想这件事竟使阿英多次受到党内批评，但他却没将责任推在宗璞身上。难怪乎多年后，宗璞深情地回忆道：“我觉得阿英同志对人以诚心相待，不会像下棋似的算计好几步。虽然革命经历很长，还是一介书生。”^①这是对阿英最真实的评价，或许，这也是解开阿英现象的一把关键性钥匙。

四

阿英集战士、作家、学者于一身，但他首先而且始终是一名战士。战士先进的世界观、敏锐的眼力、博大的心胸，使阿英在创作与学术研究中能迅速以别开生面的立意、切中肯綮的批判激起反响，并能在别人不屑一顾的领域，取得开拓性成果。然而，战士冲刺般的热情代替不了冷静的分析探究；不囿于旧说的否决精神也不等于扎实的理论构建，阿英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往往存在着以偏概全的缺憾和教条化的偏颇。

1928年，阿英从革命第一线撤退到上海，与蒋光慈等人创立了“太阳社”。他立即运用自己在革命战火中植立起来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方法进行普罗文学的鼓吹。他愤怒抨击某些人认为无产阶级文艺粗糙、概念、难以卒读的看法，公开放言：“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不会是要人欢喜看，只有资产阶级的艺术是专门供人欣赏、玩弄的。”^②立论虽偏，却不同凡响。而且，战士的

^① 宗璞：《飘忽的云·序言》，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② 钱杏邨：《从东京回到武汉》，《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2卷，《阿英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思维,也使阿英较早地认定了文学的阶级性。他明确地说:“新兴文学是新兴阶级革命的战斗的鼓号,是新兴阶级的战斗的武器,是新兴阶级的战斗的檄文。”^①因而,无产阶级文艺“在幼稚中,它是毫无疑问的在宣传上完成了他的任务,植立于前途发展的基石”^②,他甚至认为:“标语口号文学都含有宣传文学的本质意义。”^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阿英踏上文坛时,文艺理论的储备并不多,他是从政治宣传的角度看待文学创作,以搞阶级斗争的方法进行文学斗争。这就使他很容易接受苏联拉普的文学观点,或者可以说,拉普的文学观点进一步坚定了他固有的文学态度。阿英过激的言论一方面有力地支持了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成长,一方面也为概念化文学的一度泛滥开了理论的先导。同时,这一时期的阿英,左派幼稚病较为突出,加上血气方刚的大胆,他的不少评论文章立论偏激,矛头直指新文学运动中功勋卓著的先驱,严重地伤害了不少进步作家的感情。在反响很大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里,他错误地认为鲁迅:“完全变成一个落伍者,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在批评茅盾《从牯岭到东京》等文章的观点时,他也把茅盾视作“敌对的布尔乔亚文坛的理论”代表。这种既缺乏应有的历史眼光,又缺乏中肯的现实考察的过火批评,无疑影响到后来者对他文艺思想的肯定。一些史家也就没有对阿英的文艺思想作过细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简单地否定了阿英在无产阶级文学黎明时期所作出的拓荒性的贡献。

阿英的红楼梦研究也因为类似原因遭致同样的命运。阿英早在 1951 年评论红楼梦戏剧作品时,就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揭示了红楼梦的主题是“暴露封建贵族家庭的黑暗”^④,这应该是我国红学界运用阶级分析法“评红”,从而开创“当代红学”的真正起点,它对 1954 年“两个小人物”的“评红”

^① 钱杏邨:《作品论·“动荡”诗序》,《阿英全集》第 1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问题》,《阿英全集》第 1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③ 钱杏邨:《〈幻灭〉、〈动摇〉的时代推动论》,《海风周报》1929 年第 14、15 期合刊。

^④ 钱杏邨:《论〈红楼二尤〉》,《剧艺日札》,《阿英全集》第 8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有着极大的影响。然而，当时身为天津文化局局长的阿英无暇沉下来坚持运用这种新观点深入研究《红楼梦》著作本身，加上，他在文章中对红楼梦人物的分析明显存在着贴阶级标签的简单化倾向，浅尝辄止的卓越见解也就难以在红学界获得更多的理论认同。同样，阿英最早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勾勒出年画、连环画的发展概貌，作出了不少很有史料价值的新的考证，归纳出年画、连环画盛衰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揭开了系统研究这两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民间艺术的序幕。但也正如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不无惋惜地指出那样：“对它加上更多的资料再给以理论上的展望，不仅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上，还在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上一定会打开完全新的局面。”^①

阿英学术上的成就与不足都与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密切相关。作为战士的阿英，其学术研究无疑有着更高的唯物史观的视野，能提出一般学者囿于成见难以洞悉的新见解，有着别开生面的建树。但同时，早期革命理论的偏激与形而上学的错误，也使他的学术观点蒙上了片面性、简单化的阴影。加上阿英早期变动不居的战士经历，造成了理论研究浅尝辄止的转移，难以产生厚实的学术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阿英即使是犯“左”的理论错误，也是他真诚信仰所致。既不是他为着投机革命，以极“左”的言论掩饰极右的思想倾向；也不是他个人品性不好而以残酷批判的形式搞党同伐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阿英在学术上犯的“左”的错误是他真心认为正确而发自心声，这就是阿英学术研究上的悲剧，悲剧的形成不完全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

五

阿英的悲剧不仅在此，更大的“悲剧”在于阿英没有继续在“左”的泥潭里深陷下去，相反，阿英在觉悟到“左”的危害，有意识地纠正“左”的偏颇，抵

^① 中野美代子：《祝贺阿英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在贵国召开》，1985年3月2日《光明日报》。

制“左”的肆虐的时候，自身却遭到了“左”的迫害。记得某位哲人说过：常人与伟人的区别不在于犯不犯错误，而在于如何对待错误。左联时期，阿英在革命文学活动中，贪婪地阅读马列文论原著、古今中外大量的文学作品，丰富了自己的学养，并在创作实践中加深了对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态的本质认识，开始自觉摒除文学评论中“左”的错误。阿英不再像前期那样一味强调文学作品的政治价值、宣传工具作用，而是认识到文学多方面的社会功能，注意到文学作品寓教于乐的特点；在作品分析时，重视作品艺术性的分析，强调作品审美感染力的意义。阿英在《夜航集》一书中，对现代十六家小品文作了极其精到的艺术剖析，注意从流派角度考察文学现象，既指出某一流派风格的共同点，又细辨同一流派内作家不同的艺术表现特色。同时，阿英还在与鲁迅的共同战斗中，真诚地认识到鲁迅的伟大，正确地看到了鲁迅“英勇的、不断的和当时封建势力作战的业绩”^①以及所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解放后，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及阿英自身理论素养的提高，使他的民间艺术研究，由偏向急功近利的政治目的转向对其独特艺术品性的开掘，并将对民间艺术渊源流变的探索，对民间艺术的整理、革新与更好地适应当今人民的审美需要结合起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当阿英审慎地解剖自我、排除“左”的干扰时，愈演愈烈的“左”的思想竟使阿英身受其害。阿英在解放后虽然继续与革命同步，却没有再步“左”倾思潮的后尘。当然，凭着光荣的革命经历，阿英要迎合“左”的思潮不仅十分容易，不会引起别人多大的反感，而且会使自己平步青云。但正直的阿英不愿违心地为虎作伥，他认识到“左”的路线对革命的危害，也就毅然地与“左”的思潮分道扬镳，这就不可避免地使阿英招致一连串“左”的迫害。1957年，这位有着30多年党龄、在白色恐怖的战争岁月始终坚持革命斗争、并为革命献出爱子的老党员，竟在肃反运动中，被文化部分管运动的要人诬陷为叛徒而隔离审查，“左”倾扩大化的错误使阿英难以承受过重的精神压力致患脑血肿；1965年，文艺整风，阿英因于1962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一篇《关于〈老残游

^① 钱杏邨：《现代中国文学论·鲁迅》，《阿英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